经济学研究中的产出之谜：学术贡献与性别不平等
——以《财经研究》(2000—2012)为例

王西民[1]，崔百胜[2]

(1.上海财经大学 学术期刊编辑部，上海 200434；2.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学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认识和破解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不仅符合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有助于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文章利用《财经研究》的刊文量和引用量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特征及其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学者的刊文量仅是男性学者的 1/4，平均引用量(18.58)也低于男性学者(20.68)；引用量的分位数分析表明，男性学者的论文引用量受年龄、基金和单位类型影响，女性学者的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性别交叉项分析表明，基金和职称两个因素有效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虽然女性学者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力量快速提升，学术贡献数量也呈上升态势，但其整体学术成果非常有限，学术贡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注重自身的女性自觉和学术自觉外，女性学者还需要更多的外部学术资源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支持，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其学术潜能，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产出之谜；性别不平等；刊文量；引用量

中图分类号：C913.68；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4)10-0119-12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学术领域一直是男性主导的代表高深知识研究的特殊领域，女性学者一般很难介入，即使介入也往往在学术见解的表达上存在失语现象，表现为学术影响力的相对缺位。美国科学社会学家 Cole 和 Zuckerman(1984)将女性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仅是男性科学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现象归结为科研“成果之谜”(*productivity puzzle*)，它反映了科学领域学术成果高度分层的社会事实。而自 1969 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始终未曾出现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不均衡现象，直到 2009 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突破性别桎梏，成为历史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才改变了这一现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经历的学术问鼎之路究竟是特殊的个别案例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发展趋势呢？在 21 世纪之初探讨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问题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探索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术活动需要将现实世界高度抽象概括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以此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创造学术成果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academic ability*)，如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的能力、收集文献与整理文献

收稿日期：2014-03-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20)；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4ZS105)

作者简介：王西民(1966－)，女，甘肃永登人，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副编审；

崔百胜(通讯作者)(1975－)，男，安徽宿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学博士。

的能力、生成与厘定概念的能力、做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敏感等(肖川,2007)。学术能力的养成主要取决于三要素:第一,认知能力,如智力、获取知识的能力、技艺和特殊天赋等;第二,环境变量,如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等因素;第三,个人品格,如内在品质和创新性等内部动机、不墨守成规和原创性等(Hans,1993)。[①] Rodgers(1999)研究影响学术产出的相关因素(神圣火花、研究支持、能力等)后发现,神圣火花与学术产出的相关系数最高,达0.82,而学者性别与神圣火花的相关系数仅为0.13。[②] 可见,如果抛开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学术能力与学者性别直观上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学术贡献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呢?若存在,又是缘何而起的呢?在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如何突破性别桎梏,以创造更丰富、更多元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学术能力是内化在学者物质身体和精神内涵中的统一体,它必须借助外在的表现形式才能将学术生产力转化为能够传承的学术价值,从而构成学术贡献的重要内容。学术贡献通常表现为论文发表、课题研究和学术奖项等。本文承袭Cole(1994)的学术成就评价观点,结合我国学术评价标准的国际化趋势,将学术论文发表的量(刊文量)与质(引用量)统称为学术贡献,并利用财经类学术期刊《财经研究》2000-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突出的学术成果产出之谜,整体上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显著小于男性学者,但改善迹象明朗,未来的提升空间较大,女性学者应协同男性学者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更多的优质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与本文研究思路

希腊文中的"经济论"(*oikonomos*)一词由家庭(*oikos*)和管理(*nomos*)两部分构成,意即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经济学研究从单体的个别研究逐步走向整体的城邦、国家和社会的综合研究,意即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由此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纪元。追溯经济学的起源不难发现,经济学在发端之初就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烙印,因此对经济学者的研究也因遵循学科分类展开,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教育学三个维度来探究学术研究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

(一)社会学视角:自然属性抑或社会属性

1. 女性学者的"他者"地位。性别差异显性表现为自然性别差异,隐性表现为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建构主义者认为,性别差异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女人仅仅是一个假设的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麦克拉肯和艾晓明,2007)。波伏娃指出,女人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从未确立与男性价值相对立的女性价值,她将女性成为"他者"的原因追溯到价值领域和存在主义的意义领域。对于波伏娃的精神/身体的二元论断,伊丽格瑞批评了其设立的"主体"与"他者"的价值等级,认为不应依据男人模式刻画女人,而应赋予女人作为"他者主体"的意义,即"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谋而合。[③]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愿望日益突出,在社会的一般领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在高深知识的研究领域女性学者的"他者"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2. 女性学者的方法劣势。传统上,"女性特征定位于身体与情感,男性气质定位于思想。

①②参见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参见陈英、陈新辉:《女性视界:女性主义哲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女性蕴含情感、魅力与激情,男性从事研究、思考、写作、哲学”(Aisenberg 和 Harrington,1988)。因此,学术研究往往因其显著的挑战性而被牢固地定位于男性特质。在学术研究方法上,Oakley(2000)将定量方法归结于可靠的、理性的、客观的和公共的,与男性气质相呼应;将定性方法归结于不可靠的、直觉的、主观的和私人的,与女性气质相呼应。对此,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安·奥克利认为这是“两性战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二元对立的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两分法构成了二元结构的权力等级体系,定量与定性也不是简单的方法对立,而是包含复杂性别文化内涵的话语权力之争。①

(二)经济学视角:边缘与主流

1. 女性学者的边缘地位。学术界众多学者关注了科学研究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乔纳森·科尔和斯蒂芬·科尔,1989;张今杰和张冬烁,2008),并一致达成女性学者在科技领域研究中相对缺位的共识。Zuckerman 和 Cole(1975)以“三重障碍”理论阐释了相对缺位的原因:一是人们一般认为科学研究不适合女性;二是即使成为科学家的女性也常常被认为不如男性;三是科学共同体对女性存在歧视。女性科技工作者由于劣势累积往往比男性更有可能沦为“贫困者”,其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均逊色于男性,从而产生了科学界产出之谜。Cole 和 Singer 假设科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是一系列特殊的外部因素对其个人的“冲击”及其“反应”的结果,这种作用只发生在有限资源高度竞争的共同体中。② 王小波和董晓媛(2005)通过“中国经济学者教学科研状况调查个人调查卷”和“部分大学经济学院、系负责人的调查”发现,女性学者不仅职称和职位低于男性学者,而且经济收入和科研成果也显著少于男性学者。他们统计的2000—2002 年三种经济学刊物(《世界经济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和《当代经济科学》)中,女性经济学者发表文章所占比例在 20%左右,经济学研究中女性学者缺位现象突出。徐延辉(2002)以“自然说”、“标签说”、“人力资本说”和“经济说”解释了经济学研究中女性学者严重短缺的社会原因,并分析了女性经济学家短缺对经济学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2. 女性经济学的兴起。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基本定位于男性主体的研究范式,无论其基本假设、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都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特质,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学体系中被边缘化、他者化甚至无形化。女性经济学者不仅学术贡献小,而且其学术影响力和领导力也非常薄弱。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弥补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体系缺乏性别视角的不足。女性经济学基于家庭管理视角,通过对家庭、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学教育等现实问题的重新解读,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拓展、修正甚至颠覆。生态女性主义的创立者奥波妮倡导建立一种多元的、复杂的生态文化,以代替“全盘西化”和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主张把人看作生态存在而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希望通过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最终可以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按照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环境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这对促进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罗婷,2006),也契合了现代社会的人、社会与自然统一和谐发展的历史需要。

(三)教育学视角:性别劣势抑或性别歧视

1. 女性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在中世纪大学诞生前,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处于初萌阶段,学术活动仅仅是理智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寄往,而且基本限定在对世界本原、人生指向等哲学基本命题的探究上,因而具有明显的救赎意识(杜驰,2008),对于如此至高

①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参见林聚任:“科学界性别分化研究介绍”,《妇女研究论丛》1997 年第 2 期。

无上的社会使命，女性显然无缘参与其中。自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后，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职业（马克思·韦伯，2004），不仅以学术研究为逻辑起点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探求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以顺应变革中的社会需要，从而担负起决定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男性学者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学术研究的中流砥柱。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群体向大众群体扩展，学术职业的大门才逐渐向女性敞开。美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女教师在社区大学、四年制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中的比例分别达37.6％、29.3％和20％，女性副教授和教授也分别达25％和12％（Kelly和Slaughter，1991）。Mona等（2000）更是通过"导师计划"（高层学者配对中低层女性学术人员）试图寻找女性学术职业发展的捷径。现实中即使女性有幸进入学术领域，也主要在男性撤出的学术领域以及非终身职位上（Lomperis，1990）。

2．女性学者学术职业的困惑。虽然科学精神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但即使在崇尚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界仍无法回避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Etzkowitz等（2000）通过展现各个职业发展关键期的女性经验，揭示了科学领域中的潜在障碍和隐性排斥，这不仅影响了女性学者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而且影响了学术发展和学术资源优化配置。Duch等（2012）调查了4 292名顶尖大学教授发表的437 787篇论文数据，得出化学工程、化学、生态学、工业工程、材料科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7大领域中女性学者发表论文确实少于男性学者的结论，但这不是因为她们缺少天赋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资源需求度对不同性别学者的论文发表产生了影响。

如果说上述学术研究中的性别隔离现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那么女性学者的角色冲突问题则是其学术职业发展的显性障碍。现代家庭中虽然男性逐步承担了部分家务，但女性的角色冲突更加显著。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所做的性别与家事的调查显示，在三个级别的男女教师家务工作分摊上女性都是男性的两倍（Schiebinger和Gilmartin，2010）。Probert（2005）的大样本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聘任、晋升与工作分配等方面受到的歧视与偏见并不是由男性的主导地位造成的，而是澳大利亚日趋普遍的人口变化——离婚率的上升以及成长中孩子的需要所造成的。女性学者面临角色冲突的最大挑战是育儿，Zielinska（2009）针对两万多名年轻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同行同背景的男性，已婚、有孩子的女性晋升有保障的全职工作有35％的差距；相对于未婚、无孩子的女性，她们也有33％的差距。当然，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Zuckerman和Cole（1987）通过对包括73位女性在内的120位美国科学家进行访谈，发现结婚和育儿并不会影响女性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性别因素不足以解释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贡献差别。

为了明确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中的性别特征及其差异，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理清学术界女性学者的学术地位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以《财经研究》为例，首先，通过刊文量和刊文比例来考察学术贡献在数量上的性别差异；其次，通过引用量的*T*检验来判断学术贡献在质量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并利用两项*Logit*模型研究导致性别差异的原因；再次，通过交叉统计逐一分析年龄、职称、单位和区域对不同性别学者学术贡献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三、样本、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说明。《财经研究》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财经类专业学术期刊，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以《财经研究》2000－2012年的刊文量和2000－2010年的引用量（滞后考虑）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样本区间的确定缘由是：(1)符合数据的规范化要求。根据《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的要求，自2000年

起高校学报发表的论文需附加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份、性别、单位、职称)等信息。(2)经济环境的质变。自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才真正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世界性的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都进入了全新时期,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3)教育体制的深刻影响。1999年大学扩招,2000年研究生扩招,不仅高校的在校学生数量突飞猛进,高校学术职业队伍快速壮大,而且受益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方针政策,经济学科快速成长为热门学科,吸引了大批高智商人才加入,为产生更多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4)人口因素的影响。2000年以后正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大学或攻读研究生的阶段,在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待遇减少的情况下,女性学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是否趋于改善,这一特殊时期的样本为学术贡献的性别差异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参照。

(二)变量说明。我们选择《财经研究》2000－2012年144期中的1 915篇论文为研究样本。被解释变量为学术贡献,以第一作者为准来区别是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0表示学术贡献小,1表示学术贡献大。解释变量主要选择了年龄、职称、基金项目、所属单位以及所处地区5个指标。年龄分为30岁以下、31－45岁、46－65岁、65岁以上四档;职称分为中级及以下、副高和正高三档;基金项目分为无、省市级以下、省部级、国家级和其他五项;所属单位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部门,分为985、211、其他院校和非院校类单位四种类型,其中211高校是指除985高校外的211高校,其他院校是指除211高校外的其他学校,非院校类单位是指各类公司和研究机构等;所属地区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12个省份。

(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两项 *Logit* 模型是一种常用的广义线性模型,主要用于二元响应变量的概率建模。响应变量 Y 是一个服从二项分布的随机变量,$g[E(Y)]=\ln\left(\frac{p}{1-p}\right)=\alpha+\sum_{i=1}^{5}\beta_i x_i$。其中,$\alpha$ 是回归模型的截距,$x_i(i=1,\cdots,5)$ 是预测变量(自变量)的观测值,分别表示年龄、职称、基金、单位类型以及所处地区;β_i 是回归模型的系数;$E(Y)$ 是响应变量 Y 的期望值;$g(\cdot)$ 是一个单调且二次可微的连续函数;p 表示概率。β_i 是 x_i 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对数单位 L_i(机会比率的对数)的平均变化。在估计出 α 和 β 后,即可得到概率 p 的值,从而观察 x_i 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学术贡献概率的变化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我们首先从整体上观察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的刊文量差异及其变动趋势。表1显示,样本区间内女性学者的学术成果仅占学术成果总量的21.6%,与王小波和董晓媛(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与高校女教师45.9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的学术职业从业率相去甚远,从而存在异常突出的学术产出之谜。这说明中国女性学者虽然不存在突出的职业性别分离现象,因为女性的学术职业从业率已接近50%,但在彰显其学术成就的论文发表上劣势显著,学术地位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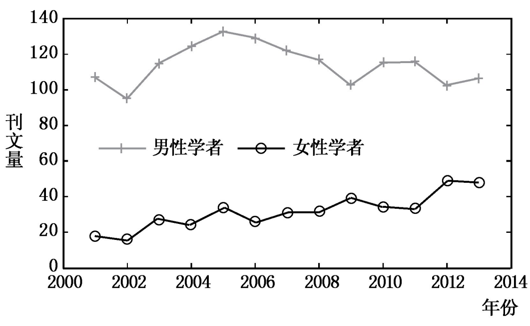

图1 刊文量的性别变化趋势

薄弱。但从趋势看,2002－2005 年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的刊文量同向上升(刊物扩版所致),之后男性学者的刊文量趋于下降,而女性学者的刊文量则逐渐上升(见图 1),刊文比例由 2000 年的 14.4%上升至 2012 年的 31.2%,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

表 1　男性与女性学者刊文量与比例

	2000 年	2003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2 年	合计
男性	113(85.6)	126(84.0)	126(80.3)	115(77.2)	106(68.8)	1 502(78.4)
女性	19(14.4)	24(16.0)	31(19.7)	34(22.8)	48(31.2)	413(21.6)

注:括号内为刊文比例,单位为%。

表 2 给出了 2000－2010 年论文引用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见,论文引用量的均值为 18.96,25%、50%和 75%分位数分别为 1、8 和 23。男性学者论文的平均引用量为 20.68,女性学者论文的平均引用量为 18.58,两者差异 T 检验表明男性学者的学术贡献质量在 1%水平上显著优于女性学者。

表 2　论文引用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中位数	25%分位数	75%分位数	男性均值	女性均值	性别差异 T 检验值
18.96	8.00	1	23	20.68	18.58	2.47

(二)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由于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引用比值作为参照,为了保证稳健性,我们分别以全体作者论文引用次数的均值、25%、50%和 75%分位数作为学术影响力(引用量)的临界值。如果引用量大于等于 18 次,则学术影响为 1,否则为 0。样本总量为 1 611。

表 3 给出了所有样本学术影响力的两项 *Logit* 估计结果。其中,B 为系数,$Wald=(B/S.E.(B))^2$。模型汇总中给出了最大似然平方的对数、*Cox-Snell* 拟合优度以及 *Nagelkerke* 拟合优度。最大似然平方的对数值用于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它在理论上服从卡方分布,显著性水平为 5%、自由度为 8 时的卡方分布临界值为 15.507,因此最大似然对数值通过了检验。似然比函数的自然对数对样本数量很敏感,作为补充,我们还做了 *Homser-Lemeshow* 检验。该检验依然以卡方分布为标准,但与常规检验不同,要求其卡方值低于临界值。在显著性水平为 5%、自由度为 8 的情况下,*Hosmer-Lemeshow* 检验的卡方值小于临界值 15.507,p 值大于 0.05,从而通过了检验。表 3 显示,在均值情况下,学者的年龄、基金类型和所属单位对学术影响力有显著影响。学者年龄与学术影响力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年轻学者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知识和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契合了当今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受到关注的可能性较高。所属单位的层次越高,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越大,符合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基金与学术影响力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正常判断不吻合,可能的原因是基金项目为刊文中的选择性项目,而且列出的也只是省部级及以上的基金项目,不能全面反映刊文的整体基金资助状况。

表 3　学术影响力的两项 Logit 估计结果

		年龄	职称	基金	单位	地区	常数项	模型汇总		*Hosmer-Lemeshow* 检验
均值	B	-0.023^{***} (0.009)	0.130 (0.097)	-0.085^{**} (0.041)	-0.169^{***} (0.060)	0.051 (0.103)	0.469 (0.288)	－2 对数似然值	2 116.062	$chi2(8)=10.822$ $Prob>chi2=0.212$
	$Wald$	6.960	1.792	4.260	8.026	0.242	2.656	*Cox-Snell* R^2	0.013	
	$Exp(B)$	0.977	1.139	0.918	0.844	1.052	1.598	*Nagelkerke* R^2	0.017	
25%分位数	B	-0.030^{**} (0.013)	0.282^{*} (0.156)	-0.161^{**} (0.063)	－0.045 (0.095)	0.301 (0.199)	3.275^{***} (0.444)	－2 对数似然值	1 021.367	$chi2(8)=5.596$ $Prob>chi2=0.692$
	$Wald$	5.241	3.294	6.525	0.224	2.285	54.502	*Cox-Snell* R^2	0.008	
	$Exp(B)$	0.971	1.326	0.851	0.956	1.352	26.441	*Nagelkerke* R^2	0.016	

续表3　学术影响力的两项Logit估计结果

		年龄	职称	基金	单位	地区	常数项	模型汇总		*Hosmer-Lemeshow* 检验
50%分位数	*B*	−0.015*	0.067	−0.167***	−0.158***	0.080	1.321***	−2 对数似然值	2 095.734	*chi*2(8)=13.893
		(0.008)	(0.096)	(0.041)	(0.059)	(0.107)	(0.283)			*Prob*>*chi*2=0.085
	Wald	3.226	0.482	16.998	7.306	0.559	21.842	*Cox-Snell* R^2	0.016	
	Exp(*B*)	0.985	1.069	0.846	0.853	1.083	3.747	*Nagelkerke* R^2	0.022	
75%分位数	*B*	−0.027***	0.179*	−0.119***	−0.192***	0.071	0.307	−2 对数似然值	1 961.008	*chi*2(8)=6.378
		(0.009)	(0.103)	(0.044)	(0.064)	(0.107)	(0.306)			*Prob*>*chi*2=0.605
	Wald	8.493	3.047	7.274	9.091	0.434	1.007	*Cox-Snell* R^2	0.015	
	Exp(*B*)	0.973	1.196	0.888	0.825	1.073	1.359	*Nagelkerke* R^2	0.022	

我们还分别对男性学者和女性学者建立学术影响力的两项 *Logit* 模型,并将性别虚拟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相乘生成性别交叉项,以进一步区分各解释变量对性别差异的影响程度。表 4 显示,男性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受到年龄、基金类型和单位类型的影响,女性学者学术影响力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无论是以均值还是 50%和 75%分位数作为学术影响力的划分标准,①影响不同性别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各因素符号均未发生变化,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性别交叉项的分析表明,基金和职称有效解释了男女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这说明女性学者职称的提高和获得高级别的基金资助可以缩小与男性学者在学术贡献上的差距。一方面,我国职称评审制度中对科研能力有较高要求,高职称女性学者的科研能力与男性学者的差距较小;另一方面,受基金资助的课题大多为近年来国内关注的热点问题,受其资助的论文关注度高于没有基金资助的论文,这也会缩小男女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差距。

表 4　学术影响力性别差异的两项 Logit 估计结果(均值)

		年龄	职称	基金	单位	地区	常数项	模型汇总		*Hosmer-Lemeshow* 检验
男性学者	*B*	−0.027***	0.085	−0.082*	−0.163***	0.036	0.689	−2 对数似然值	1 702.958	*chi*2(8)=11.968
		(0.010)	(0.106)	(0.046)	(0.065)	(0.110)	(0.321)			*Prob*>*chi*2=0.153
	Wald	8.003	0.653	3.154	6.292	0.107	4.604	*Cox-Snell* R^2	0.017	
	Exp(*B*)	0.973	1.089	0.922	0.850	1.037	1.991	*Nagelkerke* R^2	0.026	
女性学者	*B*	−0.008	0.338	−0.122	−0.213	−0.056	−0.286	−2 对数似然值	403.746	*chi*2(8)=8.370
		(0.022)	(0.251)	(0.097)	(0.161)	(0.276)	(0.691)			*Prob*>*chi*2=0.398
	Wald	0.148	1.826	1.582	1.752	0.041	0.171	*Cox-Snell* R^2	0.019	
	Exp(*B*)	0.992	1.403	0.885	0.808	1.058	0.752	*Nagelkerke* R^2	0.026	
性别交叉项	*B*	−0.003	0.292	−0.117	−0.209	0.062	−0.469***	−2 对数似然值	2 129.406	*chi*2(8)=9.345
		(0.007)	(0.181)	(0.095)	(0.160)	(0.275)	(0.057)			*Prob*>*chi*2=0.264
	Wald	0.176	2.719	1.514	1.698	0.051	67.897	*Cox-Snell* R^2	0.004	
	Exp(*B*)	0.997	1.340	0.889	0.811	1.064	0.626	*Nagelkerke* R^2	0.006	

五、学术贡献性别差异的现实解释

(一)性别差异的年龄视角

1. 学术贡献的钟形特征。要了解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在年龄上的差异,首先需确定学者学术贡献的总体年龄特征。由图 2 和表 5 可见,无论性别,学者学术成果均呈显著的钟形特征,这与 Levin 和 Stephan(1991)针对物理学、地质学等 6 个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学术生命周期的定量研究结果一致。② 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固体和凝聚态领域科学家的学术成果巅峰期为 45 岁,粒子物理领域为 39 岁,地球物理领域为 59 岁,显著晚于本文发现的经济领域学者 30 岁左右的学术成果巅峰期。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是学者在一定时期的数据有关,也可能源于各学科的不同研究特性。

---

①由于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 50%和 75%分位数的两项 *Logit* 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参见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高等教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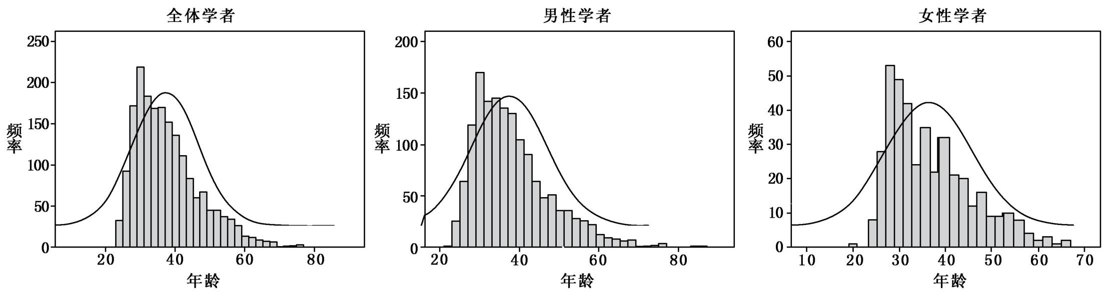

图 2　刊文学者的年龄结构直方图

2. 学术生命周期的年龄分层。表 5 显示，无论性别，学者的学术贡献均主要集中在 31—45 岁，这一阶段的学术贡献所占比例为 54.4%，这一现象符合心理学关于职业发展的研究结论，即30—40岁是个体安顿生活(工作、家庭、休闲)和实现梦想的重要职业生涯阶段，学术张力在这一时期充分释放。30 岁及以下组别中女性学者的刊文量虽然高于男性学者 8.1 个百分点，但引用量低于男性学者 10 次/篇。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女性早熟的心理特征助益其学术发展；另一方面，女性学者的“超常发挥”与女性结婚生育的现实压力有关，相对于学术质量，学术数量的突出优势印证了这一难言之隐。而 31—45 岁男性学者的刊文量虽然高于女性学者 7 个百分点，说明性别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开始显现并有强化的趋势，但引用量的性别差距却在一升(女性上升)一降(男性下降)中逐步缩小。46 岁之后，女性学者脱离了家庭生育的直接影响，与男性学者的刊文量和引用量在相对量上趋于一致。这说明要顺利度过中年期而创造第二次职业高峰很困难，需学者处理好依恋、分离、渴望亲密关系以及需要时间内省和认识自我等重要问题，这也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学术贡献具有钟形特征而非双峰特征。

表 5　不同年龄段学者刊文量与引用量的交叉统计

	30 岁及以下		31—45 岁		46—65 岁		66 岁及以上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男性	387 (25.77)	9 496 (27.57)	840 (55.93)	16 588 (23.14)	257 (17.10)	4 248 (19.58)	18 (1.20)	350 (19.44)
女性	140 (33.90)	1 896 (17.12)	202 (48.91)	3 190 (20.85)	71 (17.19)	1 102 (19.68)	0 (0)	0 (0)
总体	527 (27.52)	11 352 (25.23)	1 042 (54.41)	19 778 (22.73)	328 (17.13)	5 350 (19.60)	18 (0.94)	350 (19.44)

(二)性别差异的职称视角

1. 以副高职称为界发生突变。表 6 显示，在晋升副高之前，中级及以下学者刊文量超过 50%，其中女性高于男性 4.22 个百分点，表明年轻学者具有更强的学术进取心和更多的学术成果，女性学者在学术贡献的数量上略占优势，而男性学者则在质量上更为突出。在晋升副高之后，男性学者的刊文量和引用量趋于下降，女性学者在刊文量下降的同时引用量有所上升并超越男性学者，说明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2. 正高职称中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的刊文量走势相悖。男性正高学者的刊文量与副高学者相比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女性正高学者则下降了 3.1 个百分点，女性学者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开始显现。显性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早于男性的职业退出政策导致女性学者的学术驱动力弱化，虽然这一制度差异究竟是合理的还是歧视性的仍备受争议，但制度的影响显而易见；隐性的原因可能在于，突破传统桎梏攀升至学术顶层的女性学术精英难以享受男

性学者的优势积累所带来的“玻璃扶梯”效应,而受到“石头天花板”的限制。

表 6　不同职称学者刊文量与引用量的交叉统计

	中级及以下		副高		正高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男性	769(51.20)	17 275(26.13)	334(22.24)	5 494(19.01)	399(26.56)	7 873(22.82)
女性	230(55.42)	3 066(17.32)	99(23.86)	1 691(22.85)	86(20.72)	1 431(22.02)
总体	999(52.11)	20 341(24.27)	433(22.59)	7 185(19.79)	485(25.30)	9 304(22.69)

(三)性别差异的单位视角

1. 倒金字塔特征。由表 7 可知,与金字塔式的高校层级建制相反,近 80%的刊文量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呈现出 985—211—其他院校的倒金字塔结构。虽然目前教育部核定的 985 高校只有 39 所,但其论文发表率却高达 39.9%;211 高校虽然有百所之多,但其发文率低于 985 高校,为 38.7%;其他院校虽然数量巨大,但学术贡献非常有限,仅为 14.9%。这一结果既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相符,也与国际上学术研究的一般特点一致。女性学者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的比例为 85%,高于男性学者的 77%,表明学术竞争越充分,女性的学术潜力越有可能得到有效发挥。

2. 进一步解释。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具有制度性分割的特点,较高的行政归属级别能够高校带来更多的办学资源,较高的教育投入会促进学术声誉的提升,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导致学术劳动力市场上呈现显著的高校类型分割,即部属研究型院校一般具备主要学术劳动力市场特征,而地方教学型院校具备次要学术劳动力市场特征。国际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教授发展的诸力分析》显示,高水平学者大量聚集有利于形成科学家群落,产生智力上的“迭加效应”和“链式效应”,涌现大量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精英,这也是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累积优势的具体体现(王怀宇和沈红,2003)。

表 7　不同单位学者刊文量与引用量的交叉统计

	985 高校		211 高校		其他院校		非院校类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男性	601(40.01)	12 821(24.47)	557(37.08)	12 168(25.04)	238(15.85)	3 839(20.31)	106(7.06)	1 814(18.32)
女性	164(39.71)	2 649(19.92)	187(45.28)	2 775(19.68)	48(11.62)	581(19.37)	14(3.39)	183(14.07)
总体	765(39.95)	15 470(23.55)	744(38.85)	14 943(23.87)	286(14.93)	4 420(20.18)	120(6.27)	1 997(17.83)

(四)性别差异的区域视角

1. 突出的区域特征。由表 8 可知,发表论文的作者群体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他们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发文数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86.4%。一方面,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其自身具有学术资源优势,竞争力显著,还可以吸引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人才,保证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良好流动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不仅经济相对落后,高等教育和学术竞争力也处于劣势地位,而且人才的单向流动特点又加剧了学者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的态势。当然,《财经研究》自身的区域特性也可能强化了这一特征。

2. 发达城市的教育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女性学者无论是学术贡献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显著低于男性学者,东部地区女性学者的篇均引用量低于男性学者 4.04 次/篇,但刊文量高于男性学者 2.25 个百分点,说明市场经济的精髓不仅对物质领域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还通过教育手段对学术领域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城市集聚了我国 90%的高等教

育,是学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镇,学者的学术信念通过学术文化得以彰显,从而构成学术系统内被广为认可的学术群体的文化特征,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市场机制也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基础,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也影响大学的组织管理行为,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学术人才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显性的性别隔离趋于弱化(曾晓东,2005;阎凤桥,2005)。这也证明了虽然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但会为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谭琳,2006)。

表8 不同地区学者刊文量与引用量的交叉统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刊文量(%)	总引用量(篇均引用量)
男性	1 290(85.89)	26 011(23.27)	125(8.32)	3 060(28.60)	87(5.79)	1 571(22.44)
女性	364(88.14)	5 460(19.23)	33(7.99)	560(26.67)	16(3.87)	168(15.27)
总体	1 654(86.37)	31 471(22.45)	158(8.25)	3 620(28.28)	103(5.38)	1 739(21.45)

六、结论与展望

马克思将女性作为观察社会进步的参照物,他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拿破仑更是将女性作为改变社会的生力军,认为推动摇篮的手也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关注女性,关注经济学界女性的学术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显著的学术成果产出之谜。女性学者的刊文量仅是男性学者的1/4,学术影响力也弱于男性学者;男性学者的论文引用量受年龄、基金和单位类型影响,女性学者的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交叉统计分析揭示了年龄、职称、单位和区域视角下不同性别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及其原因。

平等是满足人类自身认识和智慧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女性学者虽然突破了学术职业的进入门槛,但依然面临严峻的学术职业发展挑战。在政策制定上,除了要保障女性学者的就业机会均等和求职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外,还需加强生育保障上的权益保护,消除用人单位承担女性社会负担的顾虑,并改变退休年龄性别不平等的保护性歧视政策,使学术女性更平等地参与到学术研究中。在学术机制上,由于学术制度是对学者活动的一系列激励或约束规则,在我国学术激励高度政治化(国家行政)和学术评价高度专家化(学术共同体)的现状下,打破女性学者向上流动的层层阻碍,使其享受更多的学术资源,都需进一步完善公开、公正和公平的"三公"学术制度。在个人努力上,女性学者自身需要足够的女性自觉和学术自觉,既要承担家庭和社会赋予的母性角色的责任,也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承担更广泛的学术传递和学术发展的职责。科斯和王宁认为,如果说18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土地市场上,19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上,20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资本市场上,那么21世纪的市场经济一定建立在思想市场上。大学是产生思想的地方,学术研究需要所有学者的共同努力,无论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都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开发学术思想,由此打开更为宽广的经济学研究空间。①

①参见"王宁教授谈与科斯合著《变革中国》:中国转型思想市场至关重要",《时代周报》第217期,2013-01-24。

主要参考文献:

[1]杜驰.高等教育发展与学术职业的制度变迁[J].高教探索,2008,(4):10－13.

[2]罗婷.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麦克拉肯,艾晓明.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王怀宇,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教授发展的诸力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3,(3):9－13.

[7]王小波,董晓媛.中国女经济学家状况调查及其分析[J].南大商学评论,2005,(3):190－202.

[8]肖川.何谓"学术能力"[J].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7,(8):1.

[9]徐延辉.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现状、原因及后果[J].国外社会科学,2002,(3):58－61.

[10]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1.

[11]张今杰,张冬烁.科学研究中的女性"相对不在场现象"——自然科学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1):187－191.

[12]Cole J R, Zuckerman H.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atterns of publ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scientists[A]. Steinkempt M W, Maehr M L.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C]. Greenwich: JAI Press, 1984.

[13]Duch J, Zeng X, Sales-Pardo M, et al. The possible role of resource requirements and academic career-choice risk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ublication rate and impact[J]. PLoS One, 2012, 7(12): e51332.

[14]Etzkowitz H, Kemelgor C, Uzzi B. Athena unbound: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Kelly G P, Slaughter S.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Dordrech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16]Mona E, Helena B, Fredrik B. Mentor programmes: A shortcut for women's academic careers?[J].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0, 25(2): 173－179.

[17]Probert B. "I Just Couldn't Fit It In": Gender and unequal outcomes in academic careers[J].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2005, 12(1): 50－72.

[18]Schiebinger L, Gilmartin S. Housework is an academic issue[J]. Academe, 2010, 96(1): 39－44.

[19]Zielinska E. Family versus science[R]. The Scientist, 2009.

[20]Zuckerman H, Cole J R. Women in American science[J]. Minerva, 1975, 3(1): 82－102.

[21]Zuckerman H, Cole J R.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science[J]. Scientific American, 1987, 256(2): 119－125.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in Economic Research: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Gender Inequity——Taking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rom 2000 to 2012 for Example

WANG Xi-min[1], CUI Bai-sheng[2]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4,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Gender inequity in academia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issue but also a practical issue.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resolution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research not only are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goal of gender equality, but also help to promote academic diversity. Based on the amount of the papers and the amount of citations of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the amount of the papers written by female scholars is only a quarter of the one written by male scholars, and the average amount of citations of female scholars (18.58) is also lower than the one of male scholars (20.68); the quantile analysis of the amount of citations shows that the amount of citations of male scholars is affected by age, funds and uni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male scholars are in line with male scholars but not significant; the gender cross-term analysis shows that funds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effectively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male and female scholars. As a whole, the academic team of female scholar has grown rapidly, academic power improves quickly, the number of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lso shows an upward trend, but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female scholars are very limited overall and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contributions should further improve. Besides focus on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consciousness, female scholars need more external academic resources and active support from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to fully mobilize and exert the potential academic momentum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Key words: economic research; productivity puzzle; gender inequality; amount of the papers; amount of citations

(责任编辑　康　健)

(上接第 118 页)

How do CEO Successors Determine Firm R&D Spending? An Analysis Based on Prospect Theory

LIU Xin[1], XUE You-zhi[2]

(1. *Department of Business English*,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disclosing R&D spending in annual reports from 2006 to 2012, this paper employs prospect theory to analyze CEO successors' tradeoff between potential profits and losses in context of leadership change, and explores firm R&D spending decision-making after the CEO successors take offi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EO successors inten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firm R&D spending after they take office; better corporate performance leads to stronger motives for the reduction in firm R&D spendi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ges of CEO successors, their motives for the reduction in firm R&D spending weaken.

Key words: CEO successor; R&D spending; prospect theory; potential profit; potential loss

(责任编辑　康　健)